

《阙与史迹蠡测》解读七千年前的沁县

——省城专家学者和乡亲关注《阙与史迹蠡测》出版

王中庆



编者按：我县史志工作者王中庆专注于沁县远古文化史研究20多年，从阙与古城、铜鞮宫认定工作，到浊漳河流域古方国研究，参阅中华探源工程和浊漳河考古发现，跟踪国内先商文化研究，立足地缘优势，经年艰苦探寻，终于在先商文化漳河型说领域占领一席之地，成就一家之言。2015年他精心编成《阙与史迹蠡测》一书，大胆提出先商文化阙与(沁县)中心说，并将文稿送交有关考古和史学家审查。本文是作者征求方家读者意见的成果汇集，也是该研究在省内外包括国家级著名学者得以充分肯定的实证。本报将这篇笔记刊出，以便爱好历史文化研究的读者参阅。

先商族中心聚落《阙与史迹蠡测》一书送审稿编制工作于2015年6月完成后，分别送请有关部门及专家学者审查，受到了始料未及的好评，尤其是引起了籍地浊漳源部分太原乡亲的共鸣，反响强烈。

2015年11月29日，本书编者如约于省文物考古所宿舍拜访了早年曾参加过我国仰韶文化发掘的资深考古学大师王先生。

王先生见面就直入主题。他说：你的文稿首先是研究先商文化提供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节点——古地名阙与(今沁县乌苏村一带)，因为商族先祖曾有阙伯之名，现代学者研究先商文化也越来越看重阙与所在的浊漳流域。你由研究阙与地名入手，上溯到先商文化，这一大胆尝试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你下了功夫，本人向你表示祝贺。

当我谈到计划出版该书，只怕有过多错误时，王先生说到：就当前史学研究概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问题还在打内仗(指主要观点认识还不一致，比如：夏的初发地，是先山西还是先河南等学术问题)，何论先商文化。只有这许多的一家之言不断发声，不同的观点不断出现，才能逐步反映出先商文化的全貌。不要怕出错，一时认识不了的问题，通过不断发声，慢慢会认识的，一时统一不了的观点，争吵一段就好统一了。史学研究，就是在肯定否定，不断肯定，不断否定的路上走过来的，先商文化研究就经历了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经历。我支持你们出版该书。

王先生对沁县出土管流爵一事非常看重。他看了文稿中二里头管流爵与南涅水管流爵对比图后说：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还是商文化，现在还有不同意见。沁县发现管流爵，应当好好研究，这也算是一件了不起的发现，只可惜图片(指本文稿中管流爵图)印的不清，无法就此说明问题。还说：印书该花的钱不能省，一省就少效果。

编者请王先生对《蠡测》一书做一总体评价时，王先生说：全书总体看，引用考古资料不够，比如，阙与一带至今尚未有重大遗址考古发现，当然不是编书人的事，而应用文献资料作证到不少。当时对王先生的这一意见未引起编者过多思考，只觉得意见是十分中肯的。

2015年12月2日、24日分别两次在省文物考古所办公大楼505室走访了对沁县文化情有独钟，为发掘开发南涅水石刻作出重大贡献的刘研究员。

刘说：看了全文后，觉得该稿有一定深度，没料到你会如此快就写出了书稿。刘先生非常急切地说：要我说本书是研究先商文化的定鼎之作，确实不敢说。因为先商文化研究目前仅是初始阶段，又是大家林立。任何一个大的史学研究成果，都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完成的，是要几代人长期努力，方可有所建树的，又加上浊漳一带到目前为止，有关商文化考古，一个像样的遗址也没有发现，仅仅露头一些点滴实物，所以说，不能把咱的文稿看作是定鼎之作。但要作为一家之言而论，你的文稿有理论观点，有考古实证，有文献依据，作为一位史志学者，还收集了民俗学方面的方言、俗语的论证材料，又有古文字甲骨学、金铭文的推定，引用了不少大家流派的学术观点旁证……，从一家之言来看，《蠡测》一书可以说能够自圆其说，观点可以成立，印刷出版是可以的。

谈到初步计划出版印刷该书时，刘先生说到：我参加了在沁县召开的两次先商文化研讨会，会后又看到你们整理的《浊漳发现》汇总资料，足见沁县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是看重当地文化资源的，现又拿出了《蠡测》文稿，准备出版，我想沁县政府会善始善终支持你们出版发行的。况且这一文稿，几乎把上党地区7000年文化面貌作出揭示，是一篇上党文化寻根、中华文明探源的力作，我想长治地区领导也会支持发表这样的文章。

当本月24日我再次见到考古学专家刘先生时，他对我说：我再次拜读了你的大作，觉得你围绕阙与地方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文活动状况，一一做分章论列的写法，条理清晰，层次感强烈，很好！但总觉得文中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偏多，而让考古实物说话的部分较为欠缺。

刘先生与王先生不约而同，说出了同一个问题后，我当时觉得这一问题严重了。刘先生还同时指出，鉴于目前有关阙与的全居民族，没有一个较大的考古遗址发现作支持，你只用了中博馆在当地出土的七足蛋形盆等实物为证据，来证明商人于史前在本地存在，虽显单薄，也算有据可依。并说：文中有关阙之泽周边高地与仰韶文化的关系，叙述的也算真切，古人在哪里居住，哪里就会留下痕迹(指道兴、长胜、白马南等地)，目前对这一带(指浊漳流域)居住的古人为何民族尚未形成定论，有炎黄文化、先夏文化、先商文化、陶寺文化等多种说法，也不是定论。总的说，阙与一带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工作。你的这一篇文章，也可算作先商文化研究过程中，又迈出的一大步。要确认浊漳流域为先商族聚居地，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做的还多着呢。

2015年12月15日，在山西大学教授楼拜访了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新教授。靳先生是我国学界知名专家，于上世纪80年代，将有关战国秦赵韩阙与之战古战场所在地的确认，由1000多年来纷争不断，莫衷一是中脱颖而出。认定在沁县西部，为我们研究阙与史奠定了基础。

靳先生看了《蠡测》文稿后，见面就对我说：有关阙与的研究，从咱们已走过的历程来看，至今还未发现什么大的错误。对此，你不应当妄自尊大。你们认定阙与是先商族居地这一观点，我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支持。你们由别的学者那里找到了一些证据，就说明与你们这一观点相同或相近的学者还大有人在，这就是你说的所谓“先商文化浊漳河型”学派。我对此是“行外汉”，请你们多与考古学方面的专家请教。

当我请靳先生对《蠡测》文稿谈些看法时，他说：总体看，考古学材料用的不少，而文献依据好像单薄一些。

靳先生与考古学专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当时我深感诧异。后仔细分析，因本书采用了考古学、地理学、文献学、民俗学、语言文字学等多科的相关资料展开论证，对于某一专家来说，都不易作出全面把握多学科材料的综合评价。对《蠡测》中采用自己专长的学科资料，注意的多一些，这仅10万字文稿，与专家自己掌握的学科资料比较，就必然会觉得文稿采用本专业资料少一些。而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资料，注意的必然少一些，这样就会觉得文稿采用自己专业之外的其他资料要显得多些。这大概就是不同学科的专家对本文稿作出截然不同评价的原因。

由上述可知，这“一多”就是考古学家觉得文献资料用的多。而文献学家又觉得考古资料用的多。对于这个多，两方面专家都未指出有“欠”的问题存在，可见是多而不冗。

这“一少”是考古学家觉得文稿采用考古资料做论证材料显得少些，而文献学专长的史学家觉得文稿采用文献资料有所不足。两方面专家对文稿中这个“少”都未指正缺失哪些资料和观点，也可说是少而不缺。

如果机械的来看这一多一少，此人说的采用该学科资料“多”，正是彼人说的采用该学科资料“少”。一多一少相较，不正好说明文稿采用资料不多也不少吗？

从更深的层次而论，编者投入研究先商文化以来，这些专家都是笔者的引路人，都是与编者一起开发浊漳河先商文化的亲历者。他们所说文稿中这个“多”现象，在笔者看来实际有另一层深意，即考古学家认为擅长文献研究的史学家做的工作要多一些，所以文稿中采用文献资料就多。史学家认为考古工作者做的工作要比自己多一些，所以，文稿中引用考古资料就显多些。这一多一少，也正是专家们自谦精神的表现。专家们不仅引导我们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还为我们树立了谦逊做人的正能量标杆，真让笔者受益匪浅。

《蠡测》文稿制作完成后，同时也送请在并

居住多年的乡亲审阅。10万字的文章，引发了驻并乡亲热爱家乡的共鸣。

一生从事传媒部门负责工作的宋某某乡亲，看了文稿后说：我们少小离家，家乡的历史知之甚少。《蠡测》把人们对家乡历史的认知，由《沁县志》《沁州志》所载的2000多年拓展到距今六、七千年。地灵人杰的故里，在每一个历史发展的节点，都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炎黄时代的灵契(即商祖契)拓荒，高辛氏时代的阙伯迁商，夏、商时期的阙方霸漳，再到西周时期的阙方封陈，春秋时期的羊舌三公，战国时期的阙与争雄……浊漳西源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一代接一代，直到秦汉以来，家乡成了人才辈出的策源地。宋先生非常兴奋的建议我们，再写本《沁县英雄儿女传》，以全面展示家乡7000年的人文史。

在省委组织人事部门工作多年，后任某单位领导的王乡亲认为，《蠡测》依据考古发现破天荒揭示出浊漳西源发展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使在外游子耳目为之一新。在他们的倡议下，于2016年3月17日在省城亲贤北街茂业天地大楼，编者向驻并联谊会部分乡亲做了本文的概要汇报。一段千古往事，引发了乡亲们对故里的许多联想。

实业家、联谊会负责人都乡亲说：都说沁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究竟有多“悠久”，有多“厚重”到什么程度，谁也没说准。看了《蠡测》才知道沁县距今六、七千年的人文史迹，在传统历史文献中已有记载，“商”就是依“漳”而得名。作为一个县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如此厚重的文化，中国少有，举世罕见。

当有说《蠡测》采用古文文献太多，文绉绉的，有点看不懂时，郝先生说：从一定意义上说，看不懂是正常的，一看就懂倒有些不正常。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我国传统文献在“厚今薄古”，不断批孔批儒，大批“封、资、修”的文化氛围影响下，批先留给我们的四书五经等古文文献，几乎成了批判对象，至多仅是“参政资料”，所以学的人不多，能够全面认知传统文献的人，少之又少。《蠡测》研究的是远古史，当然要采用传统文献记事为资料。加上这一文稿又采用了人们很少涉猎的考古资料，对于我们普通学者来说，一下子看不懂，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你让编者再通俗一些，怎么通俗？比如“仰韶文化”一词，怎么通俗的了？再通俗就成了名词解释，就成了古文今译了，也就不是论文了。

当有人提议《蠡测》一书稿由驻并联谊会筹集资金，负责送出版社发行，以表示联谊会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时，郝先生说：沁县研究先商文化已历时20多年，邀请全国著名学者开了几次研讨会，又先后出版、印刷了几部相关著作，我还是由沁县及有关部门有始有终，把《蠡测》送出版部门出版发行为好。我建议该书编者回去再找几个能把沁县文化讲清的学者，组成一个沁县文化宣讲班子，在县内外大力宣传，让县外人直到沁县，让县内人进一步解沁县，特别是让由外地调入沁县的领导人了解沁县。这项工作所需资金，我们(联谊会)全部承担，用广泛宣传沁县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在外人员对故乡的热爱之情，我觉得这样更好些。

从“公”字说起

王克章

中华民族是富有智慧与创造的优秀民族，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方块字(即汉字)，历史悠久，性质特殊。汉字构造方式“六书”，颇具匠心与智慧。其中“会意”法是把两个字或几个字组成一个字，把两个字或几个字的意义合成一个意义。比如“休”，由人和木两个字组成，一个人靠着树，表示休息。“公”字由八和厶组成，下边“厶”即私，含义为自营，自己种植禾稻养活自己。上面“八(bei)”即背，意为事物的反面，也就是“厶”的对立面，意为无私。仔细推敲，含义颇深，先八后厶，即先公后私，先后有序；八高厶低，即公高私低，等级有别；八大厶小，即公大私小，大小合理；厶下八上，即私在公下，不能出格。我们先哲创造的“公”字，不仅结构匀称和谐，而且辩证唯物，颇富哲理。公先于私，公高于私，公大于私，这是天经地义，永恒真理。一旦倒置，公将不公，私将不私，不成体系，不成社会。

比如国与家，国为公，家为私。国强民富，国泰民安，国弱民贫，国亡民哀。大唐“开元盛世”，版图辽阔，威震四海，邻国进贡，友邦来朝；经济繁荣，百业发达，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仓廪实，人民安泰。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各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你征我伐，烽火连天，中原百姓流离失所，避乱南逃，躲避毒蛇猛兽出没的深山老林。如今散落在闽粤等地的碉堡式的土楼，就是那时(还有北宋末年)中原难民逃到那里修的栖身之所，即客家住宅。

再看犹太国的兴衰史。古代聚居在巴勒斯坦的西伯来人(即犹太人)曾建立以色列和犹太国，先为亚述人、巴比伦人侵占，后被罗马帝国所灭，人口被逐出，流落到欧美各地，遭白眼，受歧视，或当奴仆做苦工，或露宿街头卖唱、占卜，更有行乞讨吃，偷鸡摸狗，过着悲惨生活。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德国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卑劣下贱，便疯狂驱逐与屠杀。如今欧洲一些地方的集中营遗址，就是杀害犹太人的场所。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在国际社会声援与支持下，部分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经过几年的战争，卧薪尝胆，苦心经营，一跃成为西亚强国，迅速跻身发达国家之林，经济繁荣，国力富强，令人刮目相看。

再比如昆虫世界的蜜蜂，蜂窝为八，蜂群为厶，即蜂巢为公，蜜蜂为私。蜂巢硕大，蜂虫众多，抗严寒酷暑，战外贼内奸，蜂居一方，兴旺强盛；倘若巢小蜂少，或死于天灾，或亡于外敌。

有则童谣很有意思：“一窝鸟儿巢，筑在大树梢。大风忽吹来，树倒巢翻了。将国来比树，国破家完了。”文字深入浅出，可谓警世名言。

综上所述，国与家，集体与个人，休戚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富民强，国泰民安；国弱民贫，国亡家灭。历史昭示世人，大厦将倾，国破家亡，每个国民都应当“先国家之忧而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之”。舍小家，保大家，毁一家之私，捍民族基业，像炳彪史册的岳飞、文天祥等无数民族英雄那样，甘洒热血献中华。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就是活生生的样板。日寇当前，国难当头，全国各族人民高举爱国大旗，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与最凶恶、最野蛮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终能驱逐日寇，还我山河，赢得伟大胜利。

目前，神州大地日新月异，气象万千，生产蒸蒸日上，经济繁荣，百业兴旺。崛起的强大中国已成为国际大家庭中兴举足轻重的一员。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人，也应当与时俱进，加强修养，提升素质，作一个新时代的优秀公民。

马克思说：“人向自身，向社会”，“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社会联系”。人要生存与发展，付出劳动才有收获，必须承认并遵守社会规范和公德。唯物辩证者认为，人是矛盾对立统一的动物，人性中优劣并存，善恶共有。百人百相，百人百性，素质不一，品位不同。有的舍己为人，无私奉献；有的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新时代的公民应该自觉自愿抑恶扬善，抑制私欲，克服缺点，弘扬善念，发扬优点，多做好事，杜绝恶行，增优减劣，兴公灭私。

抑恶减劣灭私，就是抑制私欲，杜绝邪恶，“勿以恶小而为之”，把缺点和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众所周知，私欲一旦膨胀，就会冲破理性堤坝，闯过红线，泛滥成灾。或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或图财害命，杀人放火，或唯利是图，坑害他人……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蜕变异类，坠入罪恶深渊。

扬善增优兴公，就是弘扬真善美，把优点做大，锦上添花；让亮点放大，更加光彩。像伟大人物那样，公而忘私，无私奉献。“勿以善小而不为”，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干部争当焦裕禄式的好公仆，百姓争做雷锋式的好公民。

党和政府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乃立国之本，强国之魂，高瞻远瞩，意义深远。提升国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促进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好国家，这就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追求的“中国梦”。

国家是社会躯体，家庭是社会细胞。国富民强，民富国强，同生共存，相辅相成。

国家强大兴盛，社会繁荣太平，即“八”(公)大而强；家庭人丁兴旺，幸福安康，即“厶”(私)小而壮。这就是先哲创造“公”字的涵义与真谛。

人人都要摆正公私位置，正确处理公私矛盾，当一个合格且优秀公民。

静心教书 潜心育人

王玉君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好老师的形象。做好老师，是每一个老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老师的理想和追求。我想，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各有千秋、各显身手，但有一些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质。

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好老师要有高尚品德。在通常情况下，表现为以人为本、时代精神、平等合作、为人师表四个关键词；一个核心：服务，集中表现为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为学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扎实的知识功底包括本体性知识(学科知识)、文化知识、实践知识、条件性知识(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老师的爱，既包括爱岗敬业、爱学生，也包括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好老师要有快乐之源。快乐的教师必然以对教育、对学生的热爱为前提，善于学习和积累，能正确应对压力，不断自我激励，善于自我控制，尊重学生，能以快乐感染学生，能让学生在愉快中获得知识，能够拉近师生间的距离，能把教育的要求转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

作为教师，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师生关系，和谐的师生关系应该说教师和学生人格上是平等的，在交互活动中是民主的，在相处的氛围上是和谐的。影响和谐师生关系的原因，一个是“师道尊严”的传统观念在个别教师中仍然存在，他们放不下架子，不能平等对待学生导致师生关系紧张。同时部分教师在管理、沟通上缺乏艺

术，以管代教、以堵代疏，以批评代替教育的做法挫伤学生的自尊心，使得他们的行为得不到理解，拉大了师生间的距离，并造成学生的封闭心理或逆反心理。另一个是多数教师和学生都为“分”疲于奔命。不合实际的高要求，超负荷的作业量使得部分学生、教师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边是负有责任的教师在强制学生学习；另一边是丧失选择自由被迫学习的学生把教师的行为看成是压抑、侵犯，久而久之师生关系紧张、尖锐。

全国劳动模范李素丽说过，“认真做事只能把事做对，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好。”怎样做好一名好老师？我认为一是要了解、研究学生，组建好班干部队伍。二是要实行学生自我管理。三是要掌握一定的班级管理技巧，比如记班级活动台账、制定特别班训、进行心理辅导等。作为学生人生发展直接指导者的教师，应通过完善的教育帮助它们不断认识自己的潜力和发展的可能，牵引出每个孩子内在的潜能，丰腴他们想象的翅膀，并为之铺设好起飞的跑道。

习主席指出：教师的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每一位教师及其教育工作者都需立志、博学、爱生、敬业、担当、奉献，则国家之幸，民族可兴。(作者系沁县中学初中部教师)



春到漳源

领导干部读书应具备“四种”心态

读书，是人的心灵和古今中外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相结合的过程。领导干部要完成这个过程，“简单化”、“闲休式”地浏览和欣赏是不行的，往往要付出艰辛努力和不懈追求，那就要求领导干部读书要具备“四种”心态。

第一种心态：要甘坐“冷板凳”。学习读书是寂寞和清苦的，绝不能心浮气躁，必须长年累月、持之以恒，需要静下心来，思考问题。这对平时热衷于应酬交际，忙于繁杂事务工作的领导干部而言无疑是一大考验。

第二种心态：要读透“无字书”。毛泽东同志一直倡导既要读好前人和今人的“有字之书”，更要读透社会实践这本“无字之

书”。要成为群众的先生，必须先放下架子做群众的学生。

第三种心态：要善于“取真经”。当前各种信息快速膨胀、知识层出不穷，要摄取其中科学理论、先进思想和人类文明成果，来武装充实头脑、教育启迪别人，必须广泛涉猎、善辨真伪，切不可追新猎奇、迷失方向。

第四种心态：要具备“创造力”。巴尔扎克有句名言：“一个能思想的人，才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爱因斯坦也讲过：“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通过学习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见，就要敢于质疑否定，学会创新思考，提炼升华，而不是生吞活剥、浅尝辄止或人云亦云。温保芳